

形式的复活:改写理论视角下的《生死疲劳》英译本

张琦

(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,安徽 淮北 235000)

摘要:莫言的长篇小说《生死疲劳》经译者葛浩文译成英文后,得以在海外出版推广,并屡获奖项。该英译本表现了译者的个性化翻译。从改写理论视角来看,译者是在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影响下,对原作进行改写。这一改写体现了翻译的灵活性和创造性,使作品重现了原作的艺术特色,在新的语言环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。

关键词:葛浩文;生死疲劳;改写理论;意识形态;诗学观

分类号:H315.9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1395(2018)01-0074-03

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,其英译者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成为关注的焦点。《生死疲劳》经葛浩文译成英文,得以在海外出版推广,并屡获奖项。^[1]葛氏《生死疲劳》英译本中有删节,也有改写。本文拟以勒菲维尔的翻译改写理论对此进行阐释,分析该英译本改写背后的操控因素,以求对中国文学英译提供有益借鉴。

一、改写理论:制约译者的三要素

改写理论是由勒菲维尔在他的经典著作《翻译,改写和文学名声的制控》(*Translation,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*)中提出的。作者从文化视角出发,分析讨论了各种源语言的翻译作品并明确指出:“翻译实际上是对原作的改写,无论翻译、选文、撰史、批评或者编辑,都是改写的不同表现形式。”^[2]

根据改写理论,译者不可能在“真空”中翻译,翻译必然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。因此,翻译实际上就是译者在多种文化因素影响下对原文进行的改写。译者的改写过程受到以下因素制约: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通过改写,对翻译功能的实现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影响;赞助人作为一种外部因素,影响着意识形态和诗学观。

勒菲维尔将翻译看作一种改写形式,因此打破

了翻译中以原文作为标准来评价的惯性思维。由于中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异质性,在翻译中,从文字到观念都需要译者的变通。改写理论正是从译者所处的社会背景、读者的接受能力和阅读习惯、译者的本族意识形态和诗学情状、赞助人的经济利益和其他目的等角度出发,以文化的视角解读译者对原文的忠实、创新、操纵与改写。因此,这一理论为跨文化视角下中国文学的翻译和评价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
二、改写理论与葛译《生死疲劳》:意识形态与诗学观的操控

莫言是海外翻译出版作品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,在国外获得很多奖项。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,中国文学实现了在海外更有效的传播。鲍晓英《从莫言英译作品译介效果看中国文学“走出去”》一文,分析了莫言英译作品的译介效果,通过分析莫言作品在国外获奖情况、世界图书馆馆藏量、专业人士受众量、西方主流媒体提及率、普通受众数量和销售量等数据,指出莫言英译作品“体现了极佳的译介效果”^[3]。莫言获奖,译者起着关键作用。“从根本上说,莫言作品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,最重要的还是译者所起的作用。”^[1]

葛浩文作为莫言小说的唯一英译者,其翻译极具个性化,原文本中许多情节、人物被删去,重写和

收稿日期:2017-10-10

基金项目: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委托研究项目(SK2015A810)

作者简介:张琦(1981—),女,安徽萧县人,讲师,硕士,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。

删节贯穿于译本始终。那么,译者葛浩文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?本文以莫言获纽曼华语文学奖的长篇小说《生死疲劳》英译本为例,拟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方面,佐以实证,分析《生死疲劳》改写背后的操控因素。

(一)意识形态操控下的《生死疲劳》翻译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意识形态作了如下概括: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,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,哲学、政治、艺术、宗教、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。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,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。也叫观念形态。

人类在出现社会、产生文化的同时,也就产生了意识形态。而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为,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。译者在进行翻译创作时,自觉或者不自觉地,必然会考虑到译语文化中独特的意识形态,尽量避免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。当两种文化的意识形态产生对抗时,译者可能会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,例如改写、省略等,以避免冲突,否则其翻译作品或者不能得到出版,或者不被译语文化的读者所接受。意识形态从政治、道德、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创作,这在《生死疲劳》英译本中也可可见一斑。

例如,译者把原作中“地主资产阶级般的腐朽生活”翻译成“the decadent life of the landlord class”,而省略了“资产阶级”这样的字眼。这样的省略并非译者的误译,而是译者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选择。在原作中,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被描述成剥削和欺骗普通民众的剥削阶级。然而译者考虑到中西方不同的政治形态,选择省略,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的意识形态。再如,“咱们毕竟有几分缘分”被译为“But maybe there’s something we can do together”,译者在这里没有采取直译的形式,因为“缘分”一词在中文中有着丰富的内涵,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中一个抽象的概念。中西方迥异的宗教文化意识形态,使得作者放弃字面的直译,而选择意译的方式,使译文更流畅,更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思维方式。

(二)诗学制约下的《生死疲劳》翻译

勒菲维尔认为,诗学包括两个部分,一个是文学手法、体裁、主题、原型人物和情形以及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构成的整体;另一个则是指文学的功能观,即在社会整体系统中文学扮演什么角色或应扮演什么角色。

译者在选择翻译哪一部作品和翻译策略时,除了要考虑原作是否符合当时目标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,还要考虑原作是否可以很容易地被吸收到目标语文化的文学类型中,即是否能够顺应目标语文化的主流诗学。

首先,诗学制约着译者对作品的选择。译者在翻译作品时,必然会考虑读者的需求和心理期待。例如,当被问及选择作品的标准时,葛浩文这样回答:“我通常有两个条件:其一,我喜欢且适合我译。作品里表达的情感、内容与精神内涵不会因翻译而被削弱。其二,要考虑有没有市场与读者。这一点我无法预测,但是心中会有标准,以此衡量美国人能否接受。”^[4]葛浩文选择翻译包括《生死疲劳》在内的莫言作品,也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诗学的影响。

莫言是葛浩文非常欣赏的中国作家,他认为莫言具备了一个优秀作家所应具备的所有特质,没有匠气,十多年来,一部接一部作品,在叙述方式上丝毫不重复自己,作品中的“爱和恨很能打动人”。他选择翻译《生死疲劳》,除了因为这是一部“非常有意思的作品,写得真好”,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。^[5]随着中国这些年来的快速发展,美国读者更愿意了解眼前的、当代的、改革发展中的中国。《生死疲劳》从人畜六道轮回的观点,写半个世纪中国农村的变化,因此满足了西方读者的心理期待,使他们能够管窥文学家对中国社会的看法。另外,美国人对讽刺及批评政府的内容特别感兴趣。而《生死疲劳》中,莫言让主人翁六入人畜轮回,小说嬉笑怒骂,以身体的变形、丑化为能事,极具讽刺意味。可以说,译者对翻译材料的选择正是顺应了目标语文化的主流诗学。

其次,诗学影响着译者对原文的删减。由于语言问题,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仍然处于弱势,英语世界的读者对翻译作品接受程度不高。另外,中国小说长于叙事,内容冗长。因此,葛浩文在翻译《生死疲劳》时,对原文做了大量的删减。《生死疲劳》是一部约49万字的长篇小说,葛译英文版删除了原文约5万汉字;原文中23个人物删减为17个,一些非聚焦人物和主要叙述者被略去;原文中许多场景描写、心理描写被删除。这些删减使得译文故事情节更加紧凑,语言更加简单明了,容易被吸收到目标语文化的文学类型中。

最后,在《生死疲劳》英译本中,葛浩文选词富有习语性和时代感,这也是受到了诗学的制约。为了适应目标语文化的主流诗学,使译作能够吸引读者、被读者接受,葛浩文使用了很多习语化和地道的译

语语言。在此略举几例加以说明。

例如,译者在翻译“顷刻间就会传遍全村”时,没有把“顷刻间”译成“immediately”或者“instantly”,而是使用地道的习语“like wildfire”取而代之,这样的翻译使译文更自然,更符合目标语文化的语言习惯。再如:“你大人不见小人的怪”被译为“you’re too important to worry about the problems of small fry like us”,“small fry”表示地位低下的或者不重要的人,这样的翻译更地道,容易被目标语读者接受。

译者在诗学影响下的选词还体现在对原文中四字词语的处理上。四字词语语言简意赅,韵律优美,《生死疲劳》原文中比比皆是。然而由于语言差异,这些词语无法找到对应的英文翻译,逐字翻译又难免失去原文的韵律,还会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难。译者顺应主流诗学,使用地道的英文进行改写。比如,“得意忘形”,译者没有译成“be complacent to a degree of forgetting one’s form”,而是翻译成“turn a man’s head”;“同甘共苦”则翻译成“through thick and thin”,省略了原文中的“甘”和“苦”;“毛骨悚然”则省略了“毛”的意象,译为“sending cold shivers down people’s spines”。

葛浩文在诗学制约下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对原文的改写,使得其译作选词精当,语言生动形象,更容易被目标语文化中的读者接受、欣赏。有学者评论说,“读葛浩文的翻译小说仿似读英文原创小说,却并无置身美国社会的感受。”^[6]葛浩文的翻译突破了语言的隔阂,重现了原作的艺术特色。正是这种方法,使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得以进入异域翻译文学,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。

三、葛译《生死疲劳》:形式的复活

通过改写理论赏析葛译《生死疲劳》,可以看出

文学翻译中形式的复活。这一英译本是在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控制下,译者对原文进行的解读和诠释。

译者对原作的忠实并非表现在逐字逐句的翻译中。他自己曾说,“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两种语言,真要逐字翻译,不但让人读不下去,而且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。”^[7]葛译文学作品的魅力体现在整体的艺术效果上。他不拘泥于小说字面的形式,而是深入地理解原文,然后在理解的基础上将原文的信息、思想、情感、形象等融化在流畅自然的译文当中,选词精当、地道,生动地再现了原作的语言形象,创造了良好的视觉效果。

如此改写保证了译文整体的凝练和统一,使译文获得整体性的诗学体现,从而使原作艺术特色得以重现,在新的语言环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。可以说,葛译《生死疲劳》体现了文学翻译的灵活性、创造性和艺术性,出色地重现了原作的艺术特色,实为原作形式的复活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邵璐.莫言小说英译研究[J].中国比较文学,2001(1).
- [2] Lefevere, Andre. Translation,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[M]. 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1992.
- [3] 鲍晓英.从莫言英译作品译介效果看中国文学“走出去”[J].中国翻译,2015(1).
- [4] 罗屿.葛浩文:美国人喜欢唱反调的作品[J].新世纪周刊,2008(10).
- [5] 季进.我译故我在——葛浩文访谈录[J].当代作家评论,2009(6).
- [6] 吕敏宏.手中放飞的风筝——葛浩文小说翻译叙事研究[D].南开大学,2010.
- [7] 石剑锋.葛浩文讲真话,中国小说在西方不怎么受欢迎[EB/OL]. <http://history.sina.com.cn/cul/zl/2014-04-23/105389105.shtml>.

责任编辑 强 琛 E-mail: qiangchen42@163.com